



道爾頓計畫—進步主義教育理念的實踐

顏靜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加速了西方世界工業化與都市化的腳步，產業結構的重組、社會生活的轉型以及價值觀的改變，也關係到教育思想與實踐行動的改革。工業革命使大量人口移向都市與城鎮，年輕人與鄉村生活經驗隔絕，政府比起過去變得較為民主，學校圍牆內卻仍繼續使用獨裁專制的訓練方式，不符合公民自治的需求，雖有教育家倡言個人的學習興趣，但學校實際還是制式且無趣的。十九世紀的末十年至二十世紀初期，世界各地出現具有不同特色與問題解決之道的學校或新方法，而他們共同追求的都是民主教育的理想，以自由作為美好生活基本條件的信念，例如Meriam在阿拉巴馬州創辦的有機教育學校（the School of Organic Education）、Washburne的文納特卡技術、Kilpatrick的設計教學法、法國的合作社學校（the school co-operative）、英國的童子軍運動以及Abbotsholme與Bedales等學校（Boyd & Rawson, 1965），此時期的教育也在許多方面有所成長，例如小學修業年限延長、課程內容增加了音樂、藝術與勞動訓練，高中學生數量倍增，學校的課程與教學愈來愈重視當代社會事務以及激發兒童的好奇心與創造力（林立樹，2001：299）。

道爾頓計畫是進步教育浪潮下誕生的新學校與新方法之一，它展現了一位女性教育工作者的理想實踐，融合了Dewey與Washburne的觀點，強調個體的自由發展，同時也將社會秩序的改良視為學校教育的重要任務，這個方案結合了自由與效率，不但曾經推廣應用在許多國家，直到現今仍有道爾

頓學校的持續運作，所發揮的影響力既深且遠。本文旨在介紹道爾頓計畫的起源、重要原則與實施特點，論述它所彰顯的進步主義教育信念，除了系統回顧進步教育時代的改革方案，也期能激發對於當前教育改革的啟示。

二、道爾頓計畫的起源

道爾頓計畫（Dalton Plan）是由美國教師Helen Parkhurst提出，1919年先在Berk特殊教育學校進行，稱為實驗室計畫，目標是學校生活的徹底重組，用學校秩序的簡單重建來代替頭重腳輕的機構，讓學生能享受更多的自由和適合他們學習的環境，強調孩子的學習過程與生活的重要性。1920年因為Crane夫人的激賞，在她的故鄉麻州道爾頓鎮的高中實施道爾頓計畫，算是正式定名。這種實驗計畫強調個別化教學，所謂的實驗是指由學生來做實驗，而不是把學生當作體制下的實驗品。二十世紀的英國累計曾有1500所以上的學校實施道爾頓計畫（Boyd & Rawson, 1965），也曾經推廣到英國、日本、中國、德國、瑞士、荷蘭等國。

Helen Parkhurst所創立的道爾頓學校反映了當時許多兒童中心學校秉持的重要理念，亦即「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創造潛力，學校要鼓勵兒童自由發展他們的潛能，這是社會真正致力於人類價值與卓越的最佳保證」。她關注的是要提供學生一個更好的學習方式，允許學生用他們的方式去追尋與組織自己的學習，她希望創造一個社群的情境，提供各種經驗來釋放個體或群體自然的、素樸的衝動與興趣（Semel, 1999）。發自這樣的理念



而設計出的學習環境有別於傳統的學校組織，學生並不隸屬於固定的班級，而是依據自己規劃的時間表，自行決定到各科備有不同教學設施的實驗室（lab）上課，教師以尊重兒童的態度，為學生分配學年、月、週的作業，學校的風氣是強調自由、自動自發與互助合作的，重視學習的過程，並以統計圖表來記錄學生的進步情形，取代用數字高低評斷優劣的分數評量方式。以下進一步說明道爾頓計劃的指導原則與實施特色。

三、道爾頓計劃的原則與實施

（一）道爾頓計劃的指導原則

道爾頓計劃有幾項重要的原則，包括自由、合作與計畫，首先是自由，個人可以發展自身的自由，允許學生依其能力、興趣與需要，選擇合適的教材、進度和上課時間，用他自己的方法和速度來解決問題。這種理想的自由不是放縱，其實凡事為所欲為的孩子並不是自由的，反而容易成為不良習慣的奴隸，變得自私且不易適應社會生活。

其次是合作，也就是群體生活的互動，Parkhurst相信教育是一種合作的任務，個人要為團體的成敗擔負責任，學生能夠且願意為了團體的共同利益與同伴合作。學生共同討論，藉由討論可以幫助澄清思想和計畫步驟。打破年級與班級的固定型態，學生可以在分科自學或實驗室互相研討與交流，還有師生互動的合作。

另一個重要的原則是計畫，主要指時間管理、時間的預算，學生依據自己的需要來安排和使用時間，各科教師必須為學生設計不同的作業表，即工約或月約，供學生自訂學習計畫及支配學習時間，在預定期限內完成各科所指定的功課（陳金芳、趙鈺琳譯，2005）。

經由這些指導原則，道爾頓計劃得以創造出一個獨特的教育情境，讓兒童體驗到

新的學校生活方式，在教育的過程中養成彈性的習慣與生活適應能力。

（二）道爾頓計劃的實施

Parkhurst不喜歡把道爾頓計劃看作是一種「制度」或「方法」，因為一旦成為固定的模式，就難免會失去原有的彈性空間，而漸漸變成單調甚至僵化。她認為道爾頓計劃是一種教育重組方案，可以協調教與學兩方面的活動。在實施上，每個主科都有一個實驗室，不同年級的學生在同一個實驗室工作，在計畫的開始，就要將學習任務以作業合同的形式交給學生，標準是相同的，但學習進度則各不相同。

此外，家庭系統（house system）、契約系統（contract system）、指定作業以及統計圖表的紀錄也是道爾頓計劃的創新特點，家庭系統是將中學生安排為幾個督導團體，每週與指導教師有四次晤談，在家庭會議中討論他們的課業計畫、進度問題或個人層次的態度、習慣或經驗等學校生活點滴，藉此可促進學生們的合作精神，發展他們的獨立性與社會意識。契約系統與指定作業是讓學生簽訂他們的學習任務契約，同意完成並且提供了各部分工作的概要。統計圖表是用來紀錄學生的進步情形，學校使用的圖表包括教師的實驗室圖表、學生的契約圖表、家庭圖表與出席圖表，教師圖表可看出每個實驗室的學生完成多少工作單元，提供參考資料，讓教師據以判斷學生的學習狀況，評估與學生討論學習計畫的時機，學生也可藉以瞭解自己在群體中的成就表現；學生的契約圖表用來給學生記錄他們在所有學科中的進步情形，幫助學生意識到哪些是他已完成和應該繼續完成的功課；家庭圖表主要是為家庭指導員設計的一種工具，著重在紀錄已完成的工作單元總數，其中含有紀錄個別家庭成員進步情形的空格。這些圖表有助於教師和學生了解工作單元的完成度與評估個人在



團體中的學習成就（Semel, 1999），圖表也顯示出孩子對各門課程的興趣、作業對全班整體發展的影響，而對於成績落後的學生，圖表紀錄減少了他們的挫敗感，透過合理的安排學習進度與時間，他們可以獲得更好的進展（陳金芳、趙鈺琳譯，2005）。

道爾頓計畫的實施，具體展現出進步主義的教育思想，相較於Carleton Washburne在文納特卡鎮倡行的個人系統，兩者有許多共通之處，例如強調自由與合作、強調個別化的教學，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和各自的學習進度。所不同之處在於Parkhurst提出的「實驗室」觀念與作業布置是道爾頓計劃的獨特重點，但文納特卡制並未特別指出時間計畫與管理的重要性；其次是教材的處理方式，Parkhurst的學校是提供豐富的參考資料，在學生自學的原則下，讓輔導老師從旁協助與提示，而Washburne的文納特卡學校，老師們要投注相當大的心力去編製教材。就這方面而言，由於一般的師資培育過程並未特別重視培養教師編製教材的能力，教學實務上也沒有配置時間給老師進行有系統的教材編製，若想普遍在學校中推行應用這類方案，道爾頓計畫可能會比文納特卡制有較高的可行性。

四、道爾頓計畫展現的進步主義教育理念

道爾頓計畫的基本理念與實際措施，已顯示出它帶有的進步教育色彩，若再參照進步主義教育的原則與信念加以細察（Cobb, 1928; Rugg & Shumaker, 1969），可更清楚進步教育與道爾頓計畫的關聯，下面就循著道爾頓的核心原則：自由、合作與計畫，來看其中所展現的進步教育理念。

（一）自由

進步主義教育強調教室應免於不自然的

束縛以及由外而內形成的強制性，重視兒童個別差異的適性教育，允許並鼓勵兒童個性上的差異，提供豐富的情境使每個孩子的天賦能力得以開花結果。讓兒童得以完全掌控學習的工具，而不只是獲得現成的事實，孩子不需要變成行動的百科全書，重要的是找到通往事實的途徑，學會研究方法，有能力蒐集與整理必要的資訊，知道如何在哪裡找到需要的知識，不再使孩子變成教科書的奴隸（Cobb, 1928）。在進步教育的新學校裡，舊秩序的所有嚴厲強制的規定都已經過去，在輕鬆自然的群體生活與群體研討中，可以自由發展、交換想法，透過個人的工作而進步。

（二）合作

進步主義教育重視兒童群體意識與社會意志的發展，希望兒童發展社會合作，為群體目的而努力比為了個人獲得利益來超越別人更重要（Cobb, 1928）。必須兼顧個性與社會適應，學校提供一個教育環境，讓每個孩子可以學習與他人生活，又能保有他獨特的個性，在合作生活的持續練習中，個人藉由對群體有所貢獻的活動，學得社會經驗，使個別性的發展與成功的社會參與相互調和。

（三）計畫

進步主義的學校強調學生的自我管理，自己制定規則管理自己的學業與社會行為。新自由的基礎就是整個學校圍繞著兒童來重新定位，新學校是以兒童為中心的機構，他們相信唯有透過自我管理的實踐，個人管理自我的能力才會成長，人們在練習自我管理的自由下學習民主（Boyd & Rawson, 1965; Rugg & Shumaker, 1969）。在兒童中心的學校中，學生是活躍、主動、努力工作、有創意、有組織、集合各種資源來完成任務的，而不是由教師主導其思考與計畫，學生因而能在個人和社群方面都有成長，學得自我



管理、團體事務與創意表現自我的能力。

進步主義的教育原則反映出當時的教育家認為現代兒童所需要的教育型態，他們反對不自然的古老形式與制式課程，而要孩子以有益的、富啟發性的和自然的方式獲得實質的發展，表現他們的兒童本色，道爾頓計畫以個別化的學習進度、實驗室的合作任務、家庭系統和契約系統，讓孩子用有效的方式學習自由、合作與計畫，將進步主義教育的理想拉近到實踐的層次。

五、道爾頓學校的轉變：民主或菁英教育？

道爾頓學校在Helen Parkhurst的領導下締造了傑出的表現，甚至獲得「八年研究」的肯定，1942年Parkhurst在學校財務問題與派系分裂等因素交迫下辭職，繼任的幾位校長代表了道爾頓學校的改變，Semel (1999)以任期較長、影響重大的三位校長Charlotte Durham、Donald Barr以及Gardner Dunnan作為階段的劃分來探討道爾頓學校的變遷，以下敘述之。

（一）Durham時期（1942至1960年）：帶有傳統氛圍的進步主義

Charlotte Durham原本是Helen Parkhurst時期在道爾頓學校服務的教師與行政人員，1942年繼任為第二位女性校長，她擔任校長的時期，道爾頓開始從一所進步主義的實驗學校轉變成較為傳統的菁英大學預備學校。Durham的管理大致上保留了家庭系統、實驗室、作業分配、進步圖表與學生自治的特色，但是她改以較有條理的方式來運作，使道爾頓學校轉變成一個有組織的、制度完備的教育機構，此時的道爾頓似乎難以定位在「進步主義」抑或是「傳統」的學校，過去的元素與用詞仍存在，但學校已有制服等常規化的生活，且關注大學入學的要求。整體

而言，Durham可說是做到了在學科卓越與藝術表現、個人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維持一種平衡的狀態。

（二）Donald Barr時期（1964至1974年）：

保守主義與進步主義的相遇

Donald Barr來自紐約市林肯學校，也是一所提倡進步主義教育的實驗學校，他也是哥倫比亞大學工程研究所的副院長。有鑑於當時普遍的教育問題如削減智力的課程、重要學科的失敗以及忽略具有學術天賦的孩子等等，他認為學校應有嚴謹規劃與豐富多樣的課程，允許學生選擇自己有興趣的課程並給予因應其個別需求的指導。在他任期內，道爾頓的學生人數從大約560人增加至1200人以上，他將自己的學術傳統主義強加於學校的進步主義基礎上，其間也曾引發衝突與爭議，但他的成功表現在使道爾頓成為富裕的紐約新市民想要送孩子前去就讀的一所菁英學校。

（三）Gardner Dunnan（1975至1997年）：

帶著進步主義餘韻的菁英教育

Gardner Dunnan任職校長之前是一位郊區公立學校的行政官員，他致力於健全道爾頓學校的財務基礎、制定合理的科層組織、擴展與改善自然科學的設備，並且定下嚴謹的科技任務，他認為科技是道爾頓計畫運作、幫助問題解決、個別化教學和團體工作的方法，他的經營管理即是一連串的改变、適應與行動，在此時期，道爾頓的畢業生幾乎都能進入有名望的大學，是一所成就導向、重視學術競爭與現代化的菁英學校。

今日在維基百科查詢的道爾頓學校（The Dalton School）（2010），是在美國紐約曼哈頓島上的國際知名高中，學生來自各種文化背景，從幼稚園到高中，共約1300人，超過33%為少數族裔，有20%的學生得到學費補助，2007—2008學年道爾頓學校發出的助學金數目達650萬美元。大部分的學生



從幼稚園即開始上道爾頓學校，每年有將近1000名預備上幼稚園的學生報名申請道爾頓學校，最終被錄取的學生占總申請人數的9%。從2005年到2009年，近35%的道爾頓學校畢業生選擇就讀常春藤盟校的著名高等學府。

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比利時Hasselt市附近的Rukst小學在2008年9月成立全國第一所道爾頓學校，在此之前已有Gent市的小學使用道爾頓的教學原則實施若干小時的課程。Hasselt的道爾頓學校開設初期是以學前教育及小學一、二年級為範圍，該校校長Anne Smeyers表示他們仍有四分之一的時間用在傳統式的教學，其餘時間，學生以獨立的方式學習，所有課程，學童都將收到依據個別需求設計的不同作業表，學童必須完成最終目標。學校採取責任、獨立與合作三個原則。除了比利時，道爾頓學校在荷蘭也推展得頗為成功，從1996年的120所，增加到2007年的278所（駐比利時代表處文化組，2008）。

延續近一世紀的道爾頓計畫使我們顯見其深遠的影響力，然而在社會變遷與時代巨輪運轉下，其意義與功能已不同於往昔，Semel（1999）評論說現在的道爾頓學校把重點放在學術嚴格與卓越成就上，即便家庭（house）、實驗室（lab）、作業（assignment）三大要素依舊存在，但已經不是學校的關鍵和實施焦點了。反觀進步主義教育的衰敗，有部分原因是缺乏共同的哲學命題與目的混淆不清，處在兒童發展和學校作為社會變遷行動主體的兩難僵局而無法突破，且未能與時俱進地關切隨著時代與社會變遷而浮現的新議題（Graham, 1967）；而道爾頓學校在教育市場化的社會期望下調整、改變她的面貌與內涵，或可視為其競爭求勝之道，但當我們重回道爾頓學校的教育目標：「啟發、培養每個孩子的主動性、自律

性和判斷力，同時促進學生的社會意識及集體價值觀的發展」，實應深思的是它曾秉持的進步主義教育精神與原則是否也隨之改頭換面？Gardner Dunnan校長時代的所謂進步主義餘韻殘留，至此已隱沒在追求卓越的菁英教育底下。

六、結語

進步主義教育的新學校和新教育運動的出現，具有一些共同的精神，他們都是不滿各種學校的既存現狀，並嘗試找出更好的方式來加以取代，雖然不滿的理由各不相同，包括制式學校的缺乏生氣、消極、順從一致、對孩子的傷害、忽視個別差異、為了將來而犧牲當下、成人的支配等等，但他們也有共通點，都是時代的產物，尋求人類在工業革命後失去的自由和興趣，在他們背後激勵著的理想是個人財富的民主概念，追隨著Rousseau，新學校要以他們的不同方式將此理想的真實賦予孩子的生活中，他們的共同目的是讓孩子有機會在盡可能的自然條件下成長，致力於成長的自由，讓孩子可以擁有良好規約的自由，成為好人和有效能的人（Boyd & Rawson, 1965）。

道爾頓學校秉持的理念是相信每位個體皆有獨特的創造力，學校鼓勵兒童自由發展其潛能，學校的創辦人是女性，這也顯示出二十世紀前期的新教育思潮對傳統的反動，傳統主義者持守以智識為核心的教育、訓練與權威、學術標準，而進步主義教育重視經驗，課程反映時代變遷與學生需求、以兒童為中心、自由以及個人主義（Semel, 1999），除了強調個體的發展，道爾頓計畫也志在建立一種新型態的教育社會以走向更好的社會秩序（Boyd & Rawson, 1965），道爾頓計劃可說是個別學習與團體合作兩者之間的一個平衡地帶，教師教學時必須兼顧學生個別差異，而學生也能在群體的學習與生活中獲



得自我與群性的發展。

美國近幾十年來的重大教改政策，從1970年代中期倡議回歸基本教育、1983年《國家在危機中》報告書、1991年布希政府的《美國2000法案》、1994年《目標2000：教育美國法案》以及2001年的《沒有落後的孩子法案》，透露出國家與人民對於卓越績效的渴求，在這樣的需求與氛圍中，道爾頓學校漸漸從進步主義的民主自由理想走向學術

導向的菁英教育，當我們回顧這發軔於近一世紀前的教育方案之時，除了表面可見其過去崇尚民主價值與自由學習、今日追求學術績效，可更深一層去反省社會歷史變遷中的學校教育目的，回到教育的本質與意義，面對教育改革時，才有可能如當年的進步教育家一般，產生一種為實踐理想而付諸行動的熱情，致力於使當代教育改革發揮實質的作用。

參考文獻

林立樹（2001）。《美國通史》。台北市：五南。

陳金芳、趙鈺琳（譯）（2005）。H. Parkhurst著。《道爾頓教育計畫（Education on the Dalton Plan）》。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駐比利時代表處文化組（2008，5月）。比利時第一所道爾頓學校，著重個別化教學。教育部電子報，308。2009年1月14日，取自http://epaper.edu.tw/e9617_epaper/print.aspx?print_type=windows&print_sn=1342&print_num=308

道爾頓學校（2010）。2010年10月11日，取自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9%81%93%E7%88%BE%E9%A0%93%E5%AD%B8%E6%A0%A1>

Boyd, W., & Rawson, W. (1965). *The story of the new education*. London: Heinemann.

Cobb, S. (1928). *The new school leaven: Progressive education and its effect upon the child and society*.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

Graham, P. A. (1967). Confusions of purpose. In *Progressive education: From arcady to academe* (pp.102-125.).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Rugg, H., & Shumaker, A. (1969). *The child-centered school: An appraisal of the new education*. New York: Arno Press & the New York Times.

Semel, S. F. (1999). The Dalton school: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progressive school. In S. F. Semel & A. R. Sadovnik (eds.), *Schools of tomorrow, schools of today*. (pp.171-212). New York: Peter Lang.